

我是薛中锐，一名演员。
到2015年我就从艺60年了，但是我觉得精神还好，我每天还在喊嗓子，练习吐字发声、压腿。66岁时我学会了电脑，67岁时学会了开车，我现在还能开着车出去活动，我觉得我活得很高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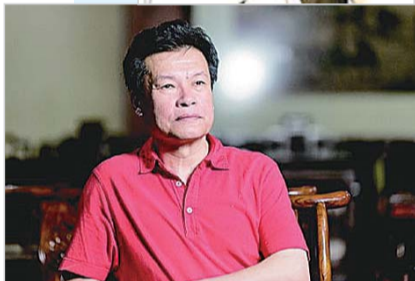
都说人老了要颐养天年，但要怎么看。我觉得不能闲下来，不能不干事，但是也不能累着。年轻的时候，我有十部长篇小说的朗诵录音，全部是义务劳动，一分钱报酬也没有，每天骑车子满头大汗，风里雪里去电台。但老了再这么拼就不行了，要注意保养身体。一般人打牌、钓鱼、玩鸟，我都不会，我就是像一头牛一样出傻力气干事的人，不可能退休，只要一息尚存，能干什么活儿就干什么。

人一生下来就注定要死掉，这个死掉就带有一定悲剧性，但是人生要尽量把悲剧演成喜剧。活着的时候，每一天要为社会、为大家做些什么事，这样就快乐了。2014年我参演了一部影片叫《医者童心》，扮演了一个国医院里的太医；还参加了很多美术展览会、书法展览会，给大家朗诵、解说。能够和大家一起活动，把自己的一些艺术上的所能贡献给大家，我非常高兴。

2015年我还有一件很高兴的事，《渔岛怒潮》在山东电视台的拍摄要完成了。我非常激动，因为40年前我播讲过这部小说，当时是万人空巷。这让我觉得虽然年龄比较大了，但是心态上依然要和社会、国家一同向前，快乐地前进！（著名话剧、影视、朗读表演艺术家）

本报记者 陈玮 采访整理

我是薛中锐 我就是个 出牛力气的人



我是孙立生，一名曲艺工作者。

现在社会一切都乱了。古语说“黄金有价艺术无价”，这在以前是常识，但现在是以价格来论艺术家的价值。比如画家，看的是画的价格；演艺家，看的是出场价格。这是一个误解、一个曲解，真正的艺术是没有价格的。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大有可为，因为它可以跟中国梦在一起，不是概念，不是说教，而是具象、形象、鲜活的。

2015年，我要写一本书，是自己的作品评论集，叫《投向水面的石子》，已经交给出版社了。还要继续争取完成《曲艺本》一书，在这本书里我要从曲艺美学角度谈，理清思路，完成我的梦想和追求。

我希望2015年的文化圈更加清晰，每个人都静下来，少一点喧嚣，少一点浮躁，做个安静的人，拿作品说话。但是，也不要期待很高，因为我们受商业之风的侵蚀已经很久。病去如抽丝，文化的弊病也是积累的过程。有好的愿望，但不要看得多么灿烂，只要做了，就有意思。（著名曲艺作家、评论家，现为中华曲艺学会副会长，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）

本报记者 魏新丽 采访整理

我是孙立生 做个安静的人

我是何中华，一名教师。
对我来说，2014年是忙碌的一年，上半年要讲四门课，再加上几个科研项目，基本上很少有自己的时间，并且产生了职业倦怠。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收获不多，目前我所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项目的研究进展不大，其他方面也都很平庸，但更多的倦怠可能来自于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，有些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的，比如课时、论文、研究项目。很多时候，我觉得这些功利性太强，以至于忽略在这个过程中享受。

比如接了研究项目总是要做，可是做得并不开心。尤其是人文科研，很难有确切的目标，但是现在的学术，却要按照一个既定目标去做，这样很难研究出有意思的东西。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在闲暇时出灵感，现在有种被驱赶的感觉，被功利驱使着。现在学术考核机制是有问题的，学术研究追求短平快，比如必须要求一个项目在两三年之内研究出来。长远来看，这对学术是很不利的。如果我们历经百年之后，再回顾这个时代，应该有所反思。

2015年，我希望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能够阅读一本书，没有功利的那种阅读，但是这种机会太少了，2015年恐怕也很难有机会。既然要做，还是应该尽职尽责地工作做好。在文化环境方面，希望国家更加重视文化，现在物质方面已经飞速发展，突飞猛进，文化相对弱一些，还没有发挥应有的影响，希望新的一年能够继续加强。不仅是儒学方面的加强，包括马克思主义、主流意识的研究以及传统文化的精华、国外先进文化的吸收，都应有所重视。此外，最重要的，无论是个人家庭的期待，还是事业的期待，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。希望自己梦想成真吧！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）

本报记者 陈玮 采访整理

我是何中华 我想不功利地 读读书

我是张炜 集中精力 勤于阅读

我是张炜，一名作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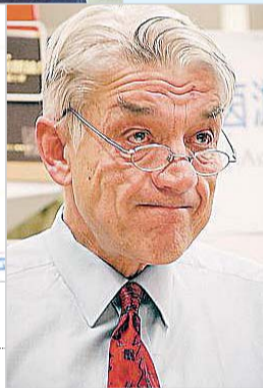
2014年我做的事情并不多，稍大一点的事情，就是出版了48卷文集。我从1973年开始写作，到2013年已经四十年了，这部文集是我至今为止篇幅最长、收入作品最全的一个文集，包括了小说、散文、文论、诗歌等。这部文集对于我的意义，是让我回望走过的路，从而总结自己。大概许多作家都渴望自己有一次总结性的出版，能够摆在自己的书架上。这既是一种告别，也是一次新的开始。

2014年上半年，我还出版了《也说李白与杜甫》，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本全新的书。它是我每年在万松浦书院春季讲坛的讲课录音稿。形成的方式和书写的内容都有点特殊，既有那种现场感和口语化，又有后期整理订正所追求的缜密。这样，与学术界、读书界的朋友交流的时候，就会拉近距离，像谈话和讨论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，它比较好读，出版后不光是中老年读者朋友，更有年轻的90后读者，都与我有很多的交流。

《也说李白与杜甫》是虚构作品之外的文字，是一种学习体会，阅读体验，是虚构作品所不能取代的。写作者向传统学习太重要了，这是文学艺术的源泉，这个源泉和生活的源泉既不同、又相同。因为传统作品中保留了活泼的、过往的，古人从生活中获得的全部智慧和深刻感悟，我们这一代作家太需要这种文化和艺术的滋养了。

在未来的这一年，我仍然要参加万松浦书院的春季讲坛，还会在这个宝贵的讲坛上，把自己对古代经典的感悟，与远道而来的学人朋友们交流。这些交流也会记录下来，形成纸质印刷品。而与此同时，我可能会进一步减少社会活动，集中精力，勤于阅读，实地勘察，找机会把长期构思的作品写完。（著名作家、山东省作协主席）

本报记者 陈玮 采访整理



我是顾彬，一个在中国工作、生活的德国人。

不论是过去的2014年，还是已经到来的2015年，我最重要的工作和任务，都是翻译和写作。这都跟中国有密切的关系。

我是顾彬(Wolfgang Kubin) 爱、诗、球 一个都不能少

2014年1月和2月，我有机会跟在北京长大、现居柏林的诗人杨炼去德国和奥地利的七个城市，介绍我翻译成德文的他的一本诗集。路上我们坐着火车，一边享受风景，一边工作。

我严肃，诗人老在笑。我问他为什么笑？他告诉我，因为他准备在大陆出版他的全集，他发现自己30年前写的诗歌太幼稚。我问：“那么为什么还要发表呢？”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。他说：“为了让读者了解我们的发展，他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开始！”

突然，我想起家里还有不少我三五十多年前写的诗集，这些诗都没有出版。我开始思考要不要学杨炼。

最后我决定学他。我开始拿出旧稿子修改。已经修改好了三本，目前我在准备第四本。2014年除了翻译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孝经》与欧阳江河的诗歌外，基本上都在忙着改我早期的文学作品。

目前我在翻译和介绍《荀子》，快完成了。2015年，我准备翻译《孔子家语》和王家新的诗歌。这两本书大概可以在2015年秋天出版。

2015年我快70岁了，我还是喜欢踢足球。不过，2014年6月踢足球后，我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摔倒了，膝盖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十字韧带、半月板、软骨都有问题。大夫说，我这辈子不能再踢足球了。我有三个原则：爱、诗、球，缺少一个，生活没有意思。因此我偷偷去踢足球。我的希望是膝盖不要开刀，汕头大学真的能实现她的诺言——从2015年开始，有中国大学最好的体育场，这样我会经常在那里跟老师们、学生们进行比赛！（德国著名汉学家、翻译家、作家）

本人撰稿